

静园文谈

第一卷

弓保安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静园文谈

第一卷

弓保安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静园文谈/弓保安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0-436-6

I. 静... II. 弓...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9990 号

静园文谈 (第一卷)

弓保安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利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 插页 216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436-6/I·294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5)



目 录

漫谈《水浒》	(1)
谈《贾儿》的艺术特点	(13)
情感·心灵·主题	
——试谈《汉宫秋》第三折的艺术特色	(17)
良好的开端	
——读小说《师傅》	(22)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编辑	(24)
读《唐诗小史》有感	(27)
读《喜剧世界》的三期幽默小说	(29)
当代青年自己的刊物	
——简评《当代青年》	(32)
愿《故事百家》越办越好	(36)



有感于报纸广告化	(39)
报刊何时无差错	(41)
浅议双效书选题	(43)
终审笔记一束	(48)
哲学与文学的美妙结合	
——简评《周国平文集》	(55)
《魂系襄渝线》阅稿随感	(58)
提倡真诚的文风	
——读《文艺报》5月28日《理论与批评》版	
有感	(72)
《梦里丁香》读稿随感	(77)
《山河永恋》责编手记	(82)
摆脱事务 抓好大事	
——在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的部分出版社总编辑工作	
座谈会上的发言	(95)
读《文艺报》刊发的编辑复信有感	(99)
关于《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一书的阅稿意见	(102)
设计反映内容 突出创新意识	
——谈《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的整体设计	(105)
《信言集》缘何受欢迎?	(107)
我读《方言误读》	(112)
给《延河》执行主编子心的信	(114)
《灵魂的颤栗》后记	(116)
《呼唤大自然》后记	(118)
《拳客五哥》后记	(120)
王盛华《梦在雨季》序	(126)



《霍松林诗词联书法选》跋	(135)
效益、创新及其它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度选题工作会议上	
的会议总结讲话	(138)
《拳客五哥》的创作	(149)
附录:文化艺术报网站的网友评论(摘编)	(157)
诗词界的榜样	
——读张勃兴的《荏苒录》	(159)
《柔肠词》的创作	(164)
附录:文化艺术报网站的网友评论(摘编)	(18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读书笔记	(198)
读《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论革命悲剧)》	(199)
读《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	(204)
附录:大学时的一则读书笔记	(209)
读《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论现实主义》	(210)
读《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论倾向	
文学》	(216)
读《恩格斯给爱因斯特的信——论易卜生》	(221)
读《论文化的各种形态(科学、技术、艺术)	
的不平衡发展》	(230)
读《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244)
读《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268)
读《斯大林给费里克斯·康同志的信》	(272)
读《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279)
读《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285)



附录一：一片多情的闲云 ——记德艺双馨的作家弓保安	吴祥锦 (291)
附录二：弓保安主要著作	(298)
附录三：关于弓保安著作的部分评论	(300)
后 记	(306)



漫谈《水浒》

《水浒》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无论出自什么目的，都无法抹去它的光辉。封建社会禁止它，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它，“四人帮”否定它，都没有阻止它在人民中间流传，便是明证。

这部书第一次把农民起义作为题材，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斗争画面，反映了农民起义队伍的形成、发展、壮大和悲惨的结局，是一部悲壮的农民革命战争史。

作品通过对农民起义全过程的描述，通过对鲁智深、晁盖、吴用、刘唐、三阮、宋江、林冲、武松、解珍、解宝等众多的梁山好汉参加起义的不同道路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形



象地说明了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官逼民反。这就使作品具有极大的思想深度，是我们认识封建社会、认识农民战争的一面镜子。

《水浒》的伟大在于，它所揭示的“官逼民反”的规律，不仅有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而且有迄今为止的一切私有制社会（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的普遍性。奴隶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亦如此。因为有压迫就有反抗。尽管被压迫者很宽容，很有忍耐力，但要生存，到了生存不下去时，就会起来反抗；尽管压迫者有财力有权力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被压迫者的反抗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但到了被压迫者生存不下去时，还是要起来反抗。而且，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成正比一样，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因此，被压迫者的反抗往往成为摧枯拉朽的革命洪流，被压迫者反抗的结果，往往是压迫者的垮台，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甚至是旧的社会形态的灭亡、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如此。当代资本主义从无产阶级多次的反抗中，从无产阶级革命中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吸取了社会主义的一些长处，比如吸取计划经济的长处以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减轻经济危机的危害，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缓和了阶级矛盾，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我以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明智和先进的表现。但这也说明，即使强大如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也不能忽视民（主要是工人、农民）的生存问题，否则就会“官逼民反”。而且，缓和不等于消除，更不等于一劳永逸地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的社会弊病，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是无法



消失的，只能暂时减轻或缓和。因此，《水浒》还是一面有普遍意义的镜子。

在《水浒》中，对于贪官污吏，农民起义的好汉们敢恨、敢反。梁中书搜刮民财，晁盖等七条好汉敢骂。生辰纲是民脂民膏，是不义之财，好汉们敢于智取。黄文柄、张都监、张团练、刘知寨等等，是贪官，好汉们敢反、敢杀。对于高俅这样权势很大的贪官，好汉们也敢于反。毛太公等地主为富不仁、助纣为虐，好汉们也敢杀。西门庆等恶霸横行乡里，好汉们也敢杀。下自地主、恶霸、地痞、流氓，上至地位很高的官僚，凡是残害百姓、不仁不义的，尽在农民起义横扫之列。甚至连皇帝，革命性彻底的李逵等人也敢于表示不恭。由此可见，作品不仅把起义英雄作为主人公，而且对他们寄予极大的同情，满怀热情地歌颂他们，对于他们的悲惨结局更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悲愤地为他们鸣冤叫屈，并假皇帝之口，表彰他们，借人民之口怀念他们，从而肯定了他们“造反有理”——这是作品反映的一个伟大思想，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个思想像黑暗中的巨星，闪耀出灿烂的光芒，影响了后来的农民起义，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恐慌和憎恨，把这部书视为洪水猛兽。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多次查禁这部书，还编写了《荡寇志》，站在与《水浒》相反的立场，将梁山好汉诬蔑为“寇”，演述陈希真、陈丽卿荡平梁山，将水泊人物一一诛灭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必须将起义农民斩尽杀绝的思想，表现了作者对农民革命的极端仇恨。但这部违背生活真实，违背客观规律，艺术性极差的反动小说，人民根本不喜欢，无人问津，无法流传，还被太平天国军队将其版片焚毁。因此，可以这样说，《水浒》既是农民起义的颂歌，也是农民阶级的代言之作。



《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封建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在残酷的专制统治的封建社会，能有这样同情农民起义、公开扯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巨著，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题材、人物、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可以说：它超过了《红楼梦》，更是其它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的。

二

但是，上面所谈的，并不能概括《水浒》全部的思想内容。它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对待。

比如，作品一方面歌颂梁山泊起义，一方而却塑造了坚持投降路线的宋江，为起义军安排了招安的道路。

宋江是作品的“第一号”正面人物，是忠孝节义的化身。他起初认为起义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罪恶勾当，不得已时，也是“权借水泊暂栖身”，从一开始落草就想招安，报效朝廷。他从接受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起，就把“替天行道”的思想明确起来，用“忠义”控制起义军的思想，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在行动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为了招安，就招降纳叛，把许多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如卢俊义等拉进了起义军的高级领导层。他多次提出招安，把起义军一步一步引向招安，最后终于招安了。招安后，立即去打方腊。最可恶的是，为了不让李逵反朝廷竟毒死了李逵，甚至自己遭到毒手，临死时还认为是死于朝廷之手，死而无憾。因此，尽管宋江在起义军的建设，在起义军的管理，在起义军的发展壮

大，在打击封建统治势力方面，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但他的招安、投降的思想实际上断送了起义军，客观上起了帮助朝廷镇压起义军的作用，这说明他在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是农民起义军的异己分子。

那么，作者对宋江持什么态度呢？

作者把宋江设计为头号正面人物，冠以“呼保义”、“及时雨”、“孝义”等称号，处处抬高宋江，大肆渲染宋江的宽仁厚德，渲染他的威信，天下豪杰莫不顶礼膜拜、云集而来。为了突出宋江，作者在征辽问题上，写吴用的动摇，写宋江的坚贞，抑吴用而扬宋江。对宋江的死，作者则以同情的笔调，大力渲染宋江的愚忠，用整个起义队伍的覆灭来衬托宋江的“忠义”，并通过皇帝和百姓来赞扬宋江，力图把宋江塑造成劝导起义军归顺朝廷的榜样。从这许多处理和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对宋江是极力歌颂又深表同情的。

为什么作者要歌颂宋江呢？

这与作者的思想立场分不开。我们知道，《水浒》成书前，就有关于梁山起义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由于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奴役，在群众创作梁山故事时，就将“忠义”思想渗透了进去。施耐庵在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加工编写《水浒》时，又必然将自己的世界观和美学思想渗透了进去。施耐庵虽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但他思想比较开明，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农民起义，就看出了“官逼民反”的实际情况，也看出了本阶级内部那些蛀虫们的丑恶，因而对贪官污吏是憎恨的，对被压迫者是同情的。正因为如此，从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他揭露贪官污吏，揭露社会矛盾，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这一点出发，他保留了群众创作对梁山起义



的同情，并将自己的同情渗入作品。但不赞成反对封建社会的根本，认为起义应当是“替天行道”，是“忠义”的事情。于是，他就在作品中表现出：贪官污吏压迫农民，农民就应该反；造反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不能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造反是为皇帝尽忠尽义，所以只能走招安的道路；招安了，就应该遵从朝廷的旨意去镇压反对皇帝的方腊；由于贪官当道，招安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尽管如此，农民起义仍然应该走这条道路——这些，便是《水浒》作者的思想逻辑。从这个逻辑出发，作者就倾全力塑造并歌颂了宋江。这样歌颂宋江的结果，就是使《水浒》贯穿了一条以“忠义”思想为基础的招安、投降的路线，仍然是或真正是为封建统治服务。

另一方面，施耐庵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矛盾的。由于《水浒》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所以《水浒》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立场和爱憎，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滔天罪行，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阶级斗争规律，歌颂了农民的反抗和农民革命战争，是表现农民革命的史诗；这无疑对施耐庵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加之施耐庵接近劳动人民的生活，耳闻目睹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地主阶级、贪官污吏的暴行以及封建社会的腐败与黑暗，因此，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施耐庵，就接受了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水浒》的思想，并在加工《水浒》时予以保留，甚至加强。他虽然通过宋江这个人物形象宣扬“忠君”思想，希望有贤明的君主改变黑暗的现实，使人民免于苦难，但宣扬得比较概念，相反却以皇帝通过地道而宿妓等情节，具体、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帝王荒淫无耻的生活，并借着李逵等梁

山好汉大骂皇帝而表达了对皇帝的不满。

三

《水浒》中，不仅宋江有“忠义”思想，其他好汉也有，比如第十九回阮小二就唱道：“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朝廷尽忠。

不仅宋江要招安，有招安幻想的人还不少。比如，就连后来坚决反对招安的武松，在第三十二回也说过：“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再如，第八十一回，燕青在名妓李师师处月夜遇道君皇帝，奏道：“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说的是“宋江这伙”，就是“宋江这些人”、“宋江这些梁山好汉”、“宋江这些头领”、“宋江这支起义军”，等等，是一个群体概念，而不是“宋江一人”。由此可见，招安的幻想具有代表性。

正因为起义队伍中普遍有“忠义”思想，不少头领积极主张招安，而反对招安的又是少数，所以，宋江的投降路线就有群众基础，就能居于主导地位。

那么，作品这样反映起义，是不是反映了历史真实呢？应该说，是反映了历史真实的。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因此，农民有“忠义”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农民由于是小生产者，阶级地位和时代条件限制了他们，束缚了

他们的政治眼光，看不到更新的斗争前途。虽然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不能推翻封建压迫，不能使农民得到彻底解放。刘邦起义虽然推翻了秦的统治，但也只是用另一个封建皇帝代替了原有的封建皇帝，农民依然遭受压迫和剥削。因此，农民只有寄希望于贤明的君主。所以说，“忠义”、招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真实思想，是农民阶级忠厚、善良的反映。走招安的路，虽然不是所有农民起义的路，却是一部分农民起义的路。就这一点来说，这样反映梁山泊起义，就是反映了时代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更何况，作品也通过方腊起义，反映了农民起义斗争到底的遭路，尽管对方腊起义的描述是副线，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去写的。

并且，作品这样反映农民起义，是有事实依据的。据记载，宋江起义军于宣和三年（1121）二月，打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的海州镇）。当时的海州知州张叔夜招募敢死士，埋伏在海州城附近，以轻兵挑战，还以壮士在大海旁设伏，寻找机会攻击宋江起义军。并趁着义军登岸时，突然将义军的船只烧毁，使义军斗志大失。又乘胜邀击，将宋江的副将俘获了，于是，“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皇宋十朝纲要》卷17）。还有，李若水（北宋末年之吏部侍郎）的《捕盗偶成》中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豕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以上这些说明，《水浒》对宋江起义作如此反映，是有事实依据的，尊重了生活，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四

不但农民起义本身有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而且作者也有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作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宣扬皇权，宣扬忠孝节义，宣扬投降，宣扬招安，同情、歌颂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梁山泊起义，而否定反皇帝的方腊起义。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歌颂，是站在开明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立场上的歌颂，而不是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上的歌颂。这些，便是作者的阶级局限。作者虽然看到了社会矛盾，看到了贪官污吏给百姓造成的苦难和对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危害，但看不到封建制度本身的腐朽、反动，并且，“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者就看不到农民起义的更好的出路，看不到更新的社会前途；所以就幻想贤明的皇帝。这些，既是作者的阶级局限，也是作者的时代局限。由于有这样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就使得作者的反贪官，和宋江本人的反高俅基本一样，是地主阶级内部明智的一部分人反对不明智的一部分人。

《水浒》的作者尽管有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在作品中宣扬招安，但对招安以后起义军的悲惨命运也作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述：由于蔡京、童贯、高俅、杨戩等奸臣当道，宋江被招安后，朝廷利用宋江起义军，先征辽，后征方腊，使宋江起义军损失惨重，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仅存二十七人；蔡京、童贯、高俅、杨戩等还不放心，又施奸计，先毒死卢俊义，后毒死宋江，使宋江起义军全部毁灭。作者这样描述，是



有生活根据的，因为据《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辑稿》和《皇宋十朝纲要》等记载，宋江征方腊是确有其事的。这样的描述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即封建社会农民起义不论走的什么道路，最终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换一句话说，就是造反没有好下场。因为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的招安，和征剿一样，都是要消灭农民起义军，只不过手段不同罢了。知亳州侯蒙曾上书朝廷，提出赦免宋江，让宋江去讨方腊，使义军互相残杀，朝庭可获渔翁之利的建议；徽宗皇帝立即采纳，并将他任命为东平（今山东郓州）知府，便是明证。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宣扬招安，但对招安的结果不美化，不粉饰，而是如实地写出其悲惨的结局，并对这一悲惨的结局倾注了很大的同情。但作者的忠君思想，又便他对宋江的死作了这样的处理，即宋江发觉自己喝了毒酒，不但不怨恨朝廷，还怕自己死后李逵造反，就哄骗李逵也喝了毒酒，使自己和李逵都被毒死。这样的描述是很有深意的，这一方面表现了宋江和起义军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对当道奸臣们的控诉，还有封建愚忠思想的表现。作者的本意是宣扬招安、投降，但作品的容量却远远大于作者的主观意图，因为读者还可以从作品的形象描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起义军投降朝廷，朝廷仍把起义军当作不安全力量，必欲除之而后方可高枕无忧，可见投降没有好下场；宋江一心被招安，将起义军完全断送了，但朝廷仍然把他视为异己，将他毒死，化用一下鲁迅的用语，宋江岂不是成了丧家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乏走狗？真是可悲可叹！

虽然《水浒》有浓厚的投降主义色彩，但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作者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为农民起义开辟了广阔